

中国新文学
批评文库
Wen Xun
贺仲明\李遇春\主编

新文学的镜像



旷新年 /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新文学的镜像

旷新年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文学的镜像 / 旷新年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 4

(中国新文学批评文库)

ISBN 978 - 7 - 218 - 09288 - 1

I. ①新… II. ①旷…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3106 号

Xinwenxue de jingxiang

新文学的镜像

旷新年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出版策划: 肖风华

责任编辑: 肖风华 古海阳

装帧设计: 礼孩书衣坊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 - 7 - 218 - 09288 - 1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2.25 插页: 2 字数: 200 千

版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 (020) 83781421

总序

当前社会中，文学批评的形象已经不是那么光彩。作家在质疑批评家的严酷和片面，读者在怀疑批评家的诚信，批评家自己也不满现状，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反思的声音。这种状况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也与当前文学的整体处境有密切关系，但文学批评自身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如何恢复批评家的形象，让文学批评发挥正常功能，在文学活动中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很值得深入的思考，以及批评家们的身体力行。

在我们看来，文学批评所涉及的内涵当然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也是当前文学批评最需要加强的，是这两个方面：

一是批评的气度。所谓气度，就是要有胸怀和高度。文学的发展非常迅速，面对文学的变化和多样性发展，不是墨守成规，故步自封，以封闭的僵化的眼光去看待，而是立足于广阔的视野，以发展的姿态来认识。批评的胸怀是与批评者的思想高度相密切关联的。只有拥有对文学的深刻认识，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待现实，才可能不被现实所遮蔽，能够全面、客观地看待现实，看待文学中的潮流和变化。

二是批评的力度。批评有胸怀不是无主见、做乡愿，相反，它需要思想的独立性，需要批判精神。这就使它与批评力度结合在一起。文学批评不是廉价歌颂，不是讲人情，它最终的负责对象是文学，是我们的时代。因此，文学批评不应该有太多的顾忌，不应该考虑文学之外的人情、政治和商业等因素，应该在坚持自我的前提上，显示出自己的观点，彰显自己的力量。

文学批评的气度和力度各有侧重，但又密切关联，相互补充，共同构成着良性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就当前文学而言，无论是被众多作家诟病的酷评，还是深为读者所反感的商业批评、人情批评，都与这两方面的匮乏有直接关系。

当然，要做到文学批评的气度和力度并不容易。它需要有主观和客观

两方面的要求。从主观方面来说，批评家要有较好的自身修养。对文学的认识、见解需要对而有深度，而且对文学历史、文学理论也要有较深的造诣，能够认识和把握到文学的某些规律和审美特征。而且，更重要的是，批评家要有很好的的人格素养。有坚定的独立性。因为在当前社会，政治、经济、人情等因素严重地渗透到文学活动中，如果没有独立而坚定的人格素养，很容易随波逐流，甚至沦为权力、金钱或人情的奴隶。只有精神的独立，才能保持批评的独立。

在当前文学体制中，身处大学校园的所谓“学院批评家”应该具有某方面的客观优势。因为他们身在大学，不隶属文学体制之内，可以与文学体制、文学编辑和作家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起文学体制内的批评家，学院批评家显然可以少受一些限制和掣肘，拥有更广阔的空间和更自由的发言权。

当然，这些都仅仅只是客观条件而已。对于当前的文学批评家来说，更重要、也更艰难的还是主观条件。姑且不说文学审美和文学历史方面的较深素养，即说精神的独立性，在现在这样一个“地球村”的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使在大学校园中，要真正保持独立精神，也是相当困难的，需要批评家们自身持续不懈的人格修养。

而且，在学院内，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体制钳制，它们也会对批评家的创造性、独立性构成限制和伤害。另一方面，学院批评家也不能完全局限在学院之内，在与文学现场相隔膜的背景下闭门造车，因为文学批评也需要有文学现场感，需要了解和跟踪文学的动态，与社会相发展，否则就会影响文学批评的准确性和鲜活感。学院内的批评家要做好文学内与外、出与入之间的平衡，是一件需要仔细斟酌的事情。

出于对学院批评的期待，也出于对当前文学批评整体上的补正，我们与广东人民出版社组织了这套由学院内部文学批评家为作者队伍的文学批评丛书。相对而言，这些作者具有较好的文学史意识，能够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上来看待文学。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具有了文学批评气度和力度一定的基础。当然，这些批评是否具备了真正的气度和力度，还需要读者去检验和评判——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它最可靠的检验者只能是读者，是未来的文学史。

主编谨识
2013年9月10日

我的批评观

我们在世界中存在，在历史中生存。我们既是孤独的个人，又为历史和时代所塑造。作为60年代出生的人，我们忍受了极端的贫乏和苦难，经历了无数的灾难和震撼。

我与中国新文学的相遇，是因为对自身的关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中国“现代”是如何发生的？现代“个人”和“自我”以及现代世界观是怎样发生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重新构造了我们的世界，重新奠定了我们生活的基础，不仅白话文已经成为中国每个人普遍的书写工具，而且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也已经成为普遍的价值理想。

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危机。19世纪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深深地感觉到了这种变化和危机。他曾经说自己处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亡，另一个却无力诞生。我对阿诺德抱有深刻的同情。阿诺德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他企图依靠文化的力量来克服这种危机。也正是因此，经典的问题才在19世纪和20世纪明显地凸现了出来。尽管阿诺德认为，比起创造力来，批评是比较低级的；但是，针对当时的欧洲，阿诺德把批评置于很高的位置，因为他认为当时欧洲所缺乏的正是批评。在阿诺德看来，批评应该不服从任何外在的和实际的考虑，批评应该超然地追求纯粹的知识，批评应该成为一种洞察。他在《当代批评的功能》一文中说，批评的任务“是只要知道世界上已被知道和想到的最好的东西，然后使这东西为大家所知道，从而创

造出一个纯正和新鲜的思想的潮流”。“批评力的任务是，‘就知识的所有部门，神学、哲学、历史、艺术、科学，探寻事物本来的真面目。’于是它最后可能在理智的世界中造成一个局势，使创造力能加以利用。它可能建立一个思想秩序，后者即使并不是绝对真实的话，却也比它所取而代之的东西真实一些；它有可能使最好的思想占了优势。没有多少时候，这些新思想便伸入社会，因为接触到真理，也就是接触到人生，到处都有激动和成长；从这种激动和成长中，文学的创造时代便来到了。”在阿诺德看来，批评是创造的基础。

从19世纪末开始流行的“世纪末”这个词，到20世纪已经成为一种弥散在我们周围的生活氛围。1900年死去的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从而把我们领入了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不仅宣告了西方文明的没落，而且同时也把被迫卷入了西方文明的整个世界也带入了没落之中。正如叶芝所说的：“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马克思·舍勒说“根基的动摇”、“价值的颠覆”——我们来到了一个丧失了基础的时代。这是理查德·罗蒂所说的“后哲学文化”的时代：形而上学的崩溃，认识论的崩溃，整体性的崩溃，以致经典的崩溃。在20世纪不仅再也没有人像19世纪那样去建立宏伟的体系，而且任何价值都不再具有普遍的意义。解构中心，取消深度，反对阐释，对“元叙事”的怀疑和否定，知识已经失去了传统的尊严，真理的知识已经变成了知识的无政府主义，用费耶阿本德的话说就是“怎么都行”。后现代主义成为了20世纪独特的文化景观。

在这样一个理性、权威和标准被摧毁了的“后现代”的时代，阿诺德所说的批评早已失去了立足之地。批评，简单地来说，就是判断。真正的创造必须以批评作为支持，真正的创造力必然包含了辨识。也就是说，真正的创造无法离开批评。然而，在这个失掉了基础的时代，在这个价值倾覆的时代，在这个怎么都行的时代，批评如何可能？这样一个“后批评”的时代，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多元、宽容、自由、平等和解放吗？实际上，在一个没有批评的时代，死去的并不是权力、压迫、奴役和控制，死去的只是真理、正义、反抗和未来。因此，在我看来，人的重新发现和生命的重建有赖于批评的重建，而批评的重建，则意味着知识的重建，一个新世界的诞生必定是一种新知识的产生。

目 录 CONTENTS

代 序

我的批评观 / 1

第一辑

打开“五四”的话语结构 / 1

文学革命：进化文学史观 / 2

胡适与白话文运动 / 36

民族主义、国家想象与现代文学 / 74

学衡派与现代中国文化 / 94

胡风文艺思想研究 / 105

“五四”：历史的阐释与想象 / 150

“五四”与中国现代叙事 / 159

“20世纪中国文学”话语的重新考察 / 163

文学史：解构与重构 / 169

第二辑

在新时期面前 / 175

文艺与政治 / 176

重新思考左翼文学 / 210

新世纪“底层文学”试论

——曹征路写作的意义 / 234

写在“伤痕文学”边上 / 259

“新写实小说”的潮流 / 274

批评空间的开创？ / 287

《色·戒》：意识形态的纠结 / 297

文学的位置 / 314

重读郁达夫 / 319

沈从文的传奇 / 324

张承志：鲁迅之后的一位作家 / 331

答韩国圣公会大学白元淡教授问 / 340

第一辑

打开“五四”的话语结构

文学革命：进化文学史观

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变革往往都是以“复古”作为号召和旗帜的；然而，五四文学革命却明确地以创新为号召，在“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对比关系中，自觉地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变革与现代化。文学革命与现代进化论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联系，进化论既是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文学革命的有力武器。进化论在文学革命中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且有力地更新了文学的认识。文学革命在进化论的理论基础上重建了文学的秩序。文学进化史观构成了文学现代性的重要内容。

一、进化论与现代性

如果我们需要寻找一个概念来抓住现代的核心，最有力地表达现代的内涵，那么没有什么会比“变化”或者“进步”这个观念更为合适的了。伯曼认为，“流变（becoming）（而非实有being）的意识”是近代思想的“主题”。^{〔1〕}“这种流变意识存在于我们所谓的近代性或‘近代心灵’（the modern mind）之核心。……在培根与柏格森两个时代之间，流

〔1〕伯曼：《西方近代思想史》，李日章译，第1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

变 (becoming) 已经凌驾了实有 (being) 而成为欧洲思维的主要范畴。”他引述雷南 (Ernest Renan) 的话说: “近代评论所采取的一大新步骤, 就是 ‘以流变范畴代替实有范畴, 以相对概念代替绝对概念, 以运动概念代替不动概念。’ ”他认为 “流变” 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从时间观察每样东西 (自然、人、社会、历史、上帝), 认为它们不仅在变化而且永远在演化为新而不同的事物。它不依靠任何固定的东西、绝对的事物与 “永恒的” 观念。就历史的观点而言, 这种思维方式的本质正在于 “兴趣明显从常恒的东西身上转移到变化的东西身上。” ——正如杜威在观察达尔文主义对哲学的影响时所观察到的: “……统治了自然哲学与知识哲学两千年的那些观点, 早已成了心灵之惯见成分的那些观点, 都基于一个假设, 即假设固定的与最终的东西优于其他一切; 他们都基于一种态度, 即视变化与起源为缺憾与不实之征象。《物种原始》(Origin of Species) 这本书, 在处理绝对常恒之神圣法柜时, 在把向来视为固定与完善之典型的各种形式当做有生灭的东西而处置时, 引进了一种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终归会使知识的逻辑整个改变, 因而使有关道德、政治与宗教的探讨整个改变。”^[1]

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和进化论学说的传播将文艺复兴以来凸现出来的变化和进步的观念在19世纪后期推到了中心的地位。达尔文使一切固定和不变的东西失去了合理性, 我们的宇宙成了一个充满变动的宇宙。陈兼善在评论达尔文进化论的时候说: “研究近代思想史的人, 都知道1859年以前的世界和1859年以后的世界, 中间可以划一鸿沟。”他说, 由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分开的这两个时代, “无论学术思想政治宗教各方面, 其色彩迥乎不同”。1859年以后的世界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 那就是 “变”。^[2] 1859年之后一些重要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都把自己的哲学和思想建立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之上, 例如尼采、柏格森、杜威等。柏格森和杜威都出生于《物种起源》出版的那一年。他们的哲学

[1] 伯曼: 《西方近代思想史》, 李日章译, 第27—28页, 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 1988年。

[2] 陈兼善: 《达尔文以后之进化论》, 《民铎》3卷5号, 1922年5月。

摧毁了传统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使世界处于不断的流变之中。胡适在评论《物种起源》（胡适译为《物种由来》）对于哲学和世界观的巨大影响时说：“把‘类’和‘由来’连在一块，便是革命的代表，因为自古以来，哲学家以为‘类’是不变的，一成不变就没有‘由来’了。”^[1]冯友兰说：“柏格森哲学的特色，固在他本体论上的一个‘变’字……所以他的哲学，称为‘变之哲学’（Philosophy of Change）。”^[2]张君勱在评论柏格森在哲学上划时代性的意义时说：

呜呼！康德以来之哲学家，其推倒众说，独辟蹊径者，柏格森殆一人而已。昔之哲学家之根本义，曰常，曰不变，而柏氏之根本义，则曰变曰动。昔之哲学家曰，先有物而后有变有动，而柏氏则曰先有变有动而后有物。惟先物而后变动焉，故以物为元始的，而变动为后起的。惟先变动而后物焉，故以动为元始的，而物为后起的。……昔之哲学家曰，求真理之具曰官觉、曰概念、曰判断。柏氏曰，世界之元始的实在曰变动。故官觉、概念、判断三者，不过此变动之片断的照相。^[3]

1922年，梁启超在《生物学在学术上之位置》中评价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巨大影响说：“一种学问出来能影响于一切学问而且改变全社会一般人心，我想自有学问以来，能够比得上生物学的再没有第二种。”^[4]达尔文的进化论远远越出了生物学的范围，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成为了人们思想的基础。它已经渗透到人们意识的深处，改变了人类思维的方式。孙中山说：“自达文之书出后，则进化之说，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

[1] 胡适：《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史》，第15页，上海：世界图书馆，1925年。

[2] 冯友兰：《柏格森的哲学方法》，《民铎》3卷1号，1921年12月。

[3] 张君勱：《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谈话记》，《民铎》3卷1号，1921年12月。

[4] 梁启超：《生物学在学术上之位置》，《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第19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依归于进化矣。”^{〔1〕}进化论已经成为了苏珊·朗格所说的“大观念”，它把文艺复兴以来现代的流变观念以一种集中凝练的方式最为明确地表达出来，成为了现代世界，尤其是现代中国最为根本的释义形式。

现代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更以一种浓缩的方式充分体现了它强烈的现代性意义。在1873年翻译的英国赖尔的《地质学原理》（当时译为雷侠儿《地质浅释》）中进化论就开始进入到了中国，但当时并未在思想上产生影响。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是和“西方的冲击”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是“西方的冲击”的理论表现。进化论在中国开始成为一种意识到的理论资源是在19世纪资产阶级维新运动高涨，也即中国开始进入自觉的现代化追求之际。从通商口岸传入的进化论思想通过道咸以来不断兴盛的今文经学开始获得了有力的表达形式，同时也使传统的古老经学获得了现代性的意义。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对《礼记》《春秋》等传统典籍的阐释中，进化论开始作为一种现代的意识形态播撒了出来。

康有为在对《春秋》“三世”的阐释中第一次赋予了历史以变化和进步的形式，第一次将历史从漫无方向的轮回里转向了未来进步的目的。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盖中国自创意言进化学者，以此为嚆矢焉。”^{〔2〕}梁启超在评述康有为的“三世”说的进化论意义时说：“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释经世之志。”^{〔3〕}进化的理念使“新”成为了神圣的事物，“变”成为了自然的规律。康有为在上光绪皇帝书中说：“英人培根当明永乐时创为新义，以为聪明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华，主启新不主仍旧，

〔1〕孙中山：《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孙中山选集》，第1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2〕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文集》之六，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3〕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之七，第99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主宜今不主泥古。”^{〔1〕}资产阶级维新派凭借今文经学为他们的变法维新建立意识形态的基础，为他们的变法维新提供合法的依据。康有为说：

“《春秋》三世，取其变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即此意也。”^{〔2〕}他将儒家典籍按照现实政治的需要重新组织成了新的秩序和意义世界。“昔孔子之作《六经》，终以《易》、《春秋》。《春秋》发明改制，《易》取其变易。天人之道备矣。”他充分将传统经典中变化求新的意义阐释出来，形成了一种新的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千年一大变，百年一中变，十年一小变。”^{〔3〕}变化终于代替“天不变，道亦不变”而上升为宇宙规律。

谭嗣同是中国近世最有冲击力的思想家。他的《仁学》充满了对进化哲学的热烈赞颂。他的哲学真正不愧是“维新”的哲学：

反乎逝而观，则名之曰“日新”。孔曰：“革去故，鼎取新。”又曰：“日新之谓盛德。”……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时不新，何以寒燠发敛之迭更？草木不新，丰孳者歇矣；血气不新，经济者绝矣；以太不新，三界万法皆灭矣。

谭嗣同的“新”之一词具有了极大的阐释能力，把儒、佛和基督教的思想都阐释到进化论中来：“孔曰‘改过’，佛曰‘忏悔’，耶曰‘认罪’，新之谓也。孔曰‘不已’，佛曰‘精进’，耶曰‘上帝国近矣’，新而又新之谓也。则新也者，夫亦群教之公理也。”^{〔4〕}他充分利用儒、佛、基

〔1〕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姜义华、吴根樑编《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16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康有为：《康南海先生讲学纪》，《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24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3〕康有为：《变则通通则久论》，《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161—16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4〕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督教以及各种知识资源来阐释和凸现进化论的思想。“新”不仅成为一种宇宙规律，而且成为了一种价值规定。谭嗣同将“新”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和法则，赋予以充分的意义。“新之为言也，盛美无憾之言也。”他将《礼记·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加以现代性的阐释。“言新必极之于日新，始足以为盛美而无憾，执此以言治言学，固无往不贵日新矣。”维“新”成为一种价值标准，世界秩序和认知方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夷狄中国，果不以地言，辨于新，辨于所新者而已矣。”^{〔1〕}在进化论的意识形态中，夷夏之辨和中西之辨转变成为了新旧之辨和传统与现代之辨。因此可以说是进化论最有力地从根本上打开了中国现代性的大门，并且将中国与西方的空间上的冲突扭转和阐释为传统与现代的时间上的对照。

梁启超将变化描述为一种普遍的自然规律，“凡在天地之间，莫不变”，“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2〕}在对变化规律的描述中，新旧对抗和新陈代谢成为了主要矛盾和最基本的意义表现形式：“人道者未有不喜新而厌旧者哉。”“新旧者固古今盛衰之大原哉。”“开新者兴，守旧者灭；开新者强，守旧者弱。……舍旧图新，朝更一制，不昕夕而全国之旧法尽变矣。不旬日而全球之旧法尽变矣。无器不变，亦无智不新，至今遂成一新世界焉。”^{〔3〕}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对进化论思想的阐释中表达了将“停滞”和“落后”的中国转变为“变化”和“进步”的中国的“改变中国”的强烈愿望。

现代进化论的直接传入是通过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天演论》原著是达尔文学派的科学家赫胥黎为了捍卫和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而写的通俗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1891年在英国出版。严复在原著出版四年之后即开始翻译，1898年正式出版。严复翻译《天演论》的时候，正当中国甲午战败，处于进步与落后强烈对照的现代性情境之中。在译述的过

〔1〕谭嗣同：《〈湘报〉后叙》（上），《谭嗣同全集》下册，第4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2〕梁启超：《变法通义·自序》，《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3〕梁启超：《纪世文新编序》，《饮冰室文集》之二，第46—47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程中，严复有意地背离了原书的意旨，渗透了强烈的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和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原则，将中国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鲜明地表达出来。蔡元培说，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的时候，是“常常说‘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八个字的主义”的“激进派”。^{〔1〕}《天演论》出版所产生的强大冲击力震撼了中国几代人的心灵。《天演论》成为了20世纪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进化论成为了这个时代一种最基本的公共知识与世界的图式。即使是进化论罕见的批评者章太炎在与他的敌人辩论的时候也将进化论作为新式的武器来使用：“人心进化，孟晋不已。以名号言，以方略言，经一竞争，必有胜于前者。”^{〔2〕}胡适曾经这样描绘挟西方霸权以俱来的进化论：“及其东来，乃风靡吾国，无有拒力。廿年来，‘天择’、‘竞存’诸名词乃成口头常语。”^{〔3〕}伴随“西方的冲击”的强大震撼而来的进化论思想已经深深植根于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中，章太炎说：“今人神圣不可干者，一曰公理，二曰进化，三曰唯物，四曰自然。”^{〔4〕}

20世纪初，进化论不仅成为了一种流行的思想观念，而且成为了一道能够打开一切“变化”的大门的神奇符咒。它成为了现代的意识形态。甚至可以说，在中国，进化论和生物学的科学研究没有多大关系，它彻底地被意识形态化了。进化论为新，为未来许诺和提供了价值、权力、崇拜与合法性。“时代”、“潮流”、“新”、“少年”、“青年”、“未来”等概念和名词开始流行，并且成为合法性符号。例如在梁启超诸如《新民说》《少年中国说》《过渡时代论》《新中国未来记》等写作中，进化论的强大冲力和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历史文化与价值的想象和结构能力非

〔1〕蔡元培：《五十年来之中国哲学》，《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3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2〕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汤世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3〕胡适：《藏晖室札记》卷九，《胡适留学日记》，第62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

〔4〕章太炎：《四惑论》，《太炎文录》别录卷三，《章太炎全集》（四），第44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常明显与强烈地透露出来，以至当时有人说：“旧之为字，乃新世界所痛詈。”对人最好的赞美“曰新，曰少年，曰青年。”^{〔1〕}而这时期新旧冲突不仅开始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出现，而且是一种文化创造的方式和意义构成的形式。有关未来幻想的乌托邦小说的出现，也说明了进化论所带来的人们历史想象方式的巨大改变，从此，历史就是在新的时代代替旧的时代的过程中获得意义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进化论成为了一种自觉的意识形态的武器，“新”成为了一种合法性的明显标志。“守旧党之名称，早已随清帝号以俱去，人之视新，几若神圣不可侵犯。”^{〔2〕}在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性与先锋性杂志《新青年》（最初名《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和《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以及汪叔潜的《新旧问题》。陈独秀说：“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天赋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3〕}进化论形成了崭新的世界观。在《敬告青年》中，他说：“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因此历史、传统、过去、旧成为了不合理的。东西方空间的对比由进化论转为成为了传统与现代、旧与新的对比：“固有之论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二十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吾宁忍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4〕}现代进化论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冲创力。李大钊说：“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像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5〕}1920年5月，陈兼善在

〔1〕 苍园：《苍园谑语·说新旧》，《月月小说》第1年12号，1907年12月。

〔2〕 汪叔潜：《新旧问题》，《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

〔3〕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

〔4〕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

〔5〕 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每周评论》12号，1919年3月9日。